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课程

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

中国现代文学 ②

6.6

王 野 张宝华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下）

王 野 张宝华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朝阳新华零印厂印刷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字数：163,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7⁷/₈

印数：1—8,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贵田

责任校对：陈 新

封面设计：安今生

统一书号：10371·18

定价：1.30元

目 录

第十八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	(1)
第一节	十七年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概述.....	(2)
第二节	十七年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的积极意义和教训.....	(23)
第十九章	十七年的小说.....	(29)
第一节	十七年的小说概述.....	(29)
第二节	长篇小说的丰收.....	(34)
第三节	不同题材与风格的短篇小说.....	(64)
第二十章	十七年的诗歌.....	(91)
第一节	十七年的诗歌概述.....	(91)
第二节	郭小川的诗歌创作.....	(94)
第三节	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100)
第四节	闻捷、李季的诗歌创作.....	(104)
第五节	毛泽东诗词.....	(108)
第二十一章	十七年的散文.....	(114)
第一节	十七年的散文概述.....	(114)
第二节	杨朔的散文.....	(119)

第三节	刘白羽的散文·····	(124)
第四节	秦牧的散文·····	(130)
第二十二章	十七年的戏剧·····	(135)
第一节	十七年的戏剧概述·····	(135)
第二节	老舍的《茶馆》·····	(140)
第三节	田汉的《关汉卿》·····	(146)
第四节	郭沫若的《蔡文姬》·····	(149)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的大破坏·····	(154)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 及其严重的危害·····	(154)
第二节	唯心主义理论的泛滥与阴谋文艺 的出现·····	(156)
第三节	对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抵制和 斗争·····	(158)
第二十四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163)
第一节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与文艺创作的 新面貌·····	(163)
第二节	新时期的小说·····	(169)
第三节	新时期的诗歌·····	(187)
第四节	新时期的散文·····	(209)
第五节	新时期的戏剧·····	(228)
后 记	·····	(244)

第十八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 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也迅速从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转变为社会主义文艺。

建国后的十七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在这十七年中，尽管由于党的工作方针有过严重的失误，因而使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历尽磨难，但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加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社会主义文艺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

道路曲折，成绩显著，经验丰富，教训深刻，这就是我们对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估价。

第一节 十七年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概述

一、文艺界的大会师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天津解放，长期坚持战斗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相继来到北平，形成了自“五四”以来新文艺大军的第一次胜利会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郭沫若同志在北平华北文协举行的文化界茶话会上，倡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一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不久，组成了筹委会，推选出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四十二人为筹委会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胜利召开。这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全国文艺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①会议由始至终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毛泽东同志也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除详细地介绍了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取

得胜利的情况外，着重阐发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使代表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成为大会响亮的口号。

郭沫若同志向大会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总结了三十年来新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文艺工作今后的具体任务：加强团结，深入现实，扫除旧文艺的影响，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而奋斗。茅盾和周扬分别向大会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作了总结。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和宣言，并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

第一次文代会，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这次大会总结交流了经验，增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大会制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总方针，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建立健全了文艺界的各级组织机构，加强了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领导，从而保证了文艺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向前发展。

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不久，新中国成立了。党适时地提出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战略部署和任务，领导人民进行了土

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为文艺创作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项运动，创作出一批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迈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步。但是，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一时还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和饱满的创作热情，但对全新的生活还缺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宏大的历史波澜中难免感到困惑；他们的理论水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表现现实和历史，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缺乏时代精神，不合时宜的作品。为了使文艺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引导作家提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加速思想改造，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讨论。

《武训传》由孙瑜、李士钊编剧，解放前开拍，一九五〇年拍完，经文化领导部门批准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写的是清末武训为了穷人文化翻身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电影上映后，评论界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部好影片，纷纷著文，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一九五一年四月，《文艺报》连续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对《武训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武训的精神值不值得赞扬，武训的道路应不应该肯定，这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以社论

名义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严厉批评了文化界思想混乱的状况，并指出，

“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年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是不能歌颂的。“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为《武训传》的讨论定了调子，很快就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所谓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当时，根据社论精神，对电影《武训传》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武训传》的主要错误有三：第一，它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第二，它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的苦行主义；第三，它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作用，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围绕电影《武训传》深入地讨论一下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对待中国人民前进的历史道路问题，本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对促进文艺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速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讨论采取并非实事求是的群众性的大批判方式，不能不说是简单粗暴的。它不仅对影片的编导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还涉及到许多歌颂过武训或赞扬过《武训传》的人。批判中也没有遵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种不适当的批判，既无助于文

艺思想是非问题的解决，也影响了文艺批评的正常开展。这次批判运动，虽按内部矛盾处理，但它开了以大批判的方式对待文艺作品的先河，不良影响是深远的。

三、对《红楼梦》研究领域中 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的批判

继电影《武训传》之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名著。“五四”以来，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日渐广泛、深入，出现了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派”，俞平伯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作了许多核实史料、辨认真伪的有益工作，但他的基本观点却是唯心主义的。建国后，他在旧著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其观点较之过去虽有进步，但并无根本的改变。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月，李希凡和蓝翎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文艺报》转载了这两位青年人批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并发表了冯雪峰写的“按语”。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个“小人物”的理论挑战“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于是迅即在思想战线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和斗争。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俞平伯断言《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之作；而全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主要手段是“写生”。在他看来，《红楼梦》不过是实录作者自身情场失意、忏悔的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这样，在客观上，他就抹杀了这部优秀名著的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二、俞平伯在研究中把《红楼梦》和中国古代作品进行简单的类比、对照，从个别情节、技巧、言词出发，武断地认为《红楼梦》“源本西厢，脱胎金瓶”。这种形式主义的“脱胎说”、“源本说”，不仅歪曲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继承性，而且也否定了《红楼梦》的独创性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三、俞平伯虽然对《红楼梦》作过许多辨伪存真的有益的考证，但他往往在一些问题上以烦琐的考证代替严肃的科学分析和文学批评，这就极大地损害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从积极意义来讲，它清算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捍卫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学术问题的讨论，冲淡了学术性，涂抹上浓烈的政治色彩，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其次，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有些见解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没有对俞平伯的整个红学研究作出客观的评价，也没能对《红楼梦》作者自身的思想局限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因而有些见

解缺乏说服力，很难令人信服。此外，对《文艺报》“按语”的指责以及对主编冯雪峰同志的处理也是简单、粗暴的，伤害了一些同志。

四、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又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四十年代和“主观论”斗争的延续和发展。早在四十年代初期，邵荃麟、何其芳、艾思奇等人就对胡风文艺思想中的错误部分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建国后，胡风虽然在文艺界的几次座谈会上就个别问题作过检查，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九五三年初，《文艺报》第二号和第三号先后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理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这样，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就由内部讨论而发展为公开批判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写下了长达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上报党中央。《意见书》中除对林、何的观点进行反批评，系统地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外，还对党如何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提出了“作为参考”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有些观点和意见是可取的，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例如，他在“关键在哪里？”一部分中，把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为代表的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理论方面的观点，概括为是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

的“五把‘理论’刀子”，这就不只是偏激，而且是十分错误的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文艺报》将《意见书》作为批判的靶子在一、二号合刊附册出版。于是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上的批判。虽然批判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政治斗争气息，但许多文章还是取慎重严谨的态度。理论批评的时间很短，五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于是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文艺思想的论争发展成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胡风的所有文艺观点和活动都成了反革命的言行，造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最大的冤案。

胡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理论批评的岗位上，在理论建设和培养作家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是，他的文艺思想却充满着矛盾，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在他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对于文艺创作的本身规律确有一些真知灼见。例如，他主张作家必须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努力“写真实”，做到“艺术和人生的一致”；主张作家须通过艺术实践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强调创作实践的意义；他还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家的战斗立场，以及从这立场所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战斗立场的）创作方法，以及从这创作方法所获得的艺术力量。”^②无疑，这些主张和见解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但是，他在阐述他的正确观点的同时，却也暴露了他理论上的混乱与错误。例如，他一贯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这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应该承认，他这一理论见解，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他却把它强调到超越正确界限的程度，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源泉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作家的“自我扩张”，“自我斗争”，这一理论上的失误，势必导致他对作家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反感，乃至格格不入。再如，他一向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的缺陷”，作家即使“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澜，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③他的这一观点，在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或可得到印证，但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说却是有害的，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还必须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胡风夸大了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不仅混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也取消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还有，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上，他虽然也承认“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化”，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他片面强调外来形式的移植，认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文艺底财富和经验”^④，才能发展我们的文化，这显然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诚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由于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广泛而且牵动了历史，因而对纠缠多年的理论是非问题的探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次运动同样存在着“左”的倾向，批判中，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文艺思想的论争，却

步步升级，演出了一幕讨伐“反革命集团”的时代悲剧。政治上的讨伐，淹没了理论上的讨论，其结果不仅无助于理论是非的解决，反而伤害了一些同志，助长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发展，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五、“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艺界的新气象

一九五六年，我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派喜人景象。这一年的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科学和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论争。”同时还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方针，完全符合科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为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也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的创作热情。于是，文艺界迅速地打开了拘谨的局面，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这种新气象在文学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创作有新的突破。首先，在繁花似锦的文学园圃里，出现了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一些青年作家，出自于对党的赤诚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敏锐地发现了影响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阴影，于是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写

下了揭露现实生活矛盾和阴暗面的特写和短篇小说。他们试图以文学为武器，清除社会溃疡，呼唤并鼓舞人们向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种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刘宾雁是这批“干预生活”作家的率先者，他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就发表了触及社会时弊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随后，又发表了《本报内部消息》。一时间，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准的《灰色的帆篷》、南丁的《科长》等相继面世。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批作品的出现，冲破了只能“歌颂”不准“暴露”的无形禁锢，使现实主义得到深化，在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给文坛带来了活力。其次，还涌现出一批敢于表现“人性”，向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世界突进的作品。如李仑威的《爱情》、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西苑草》、宗璞的《红豆》等等。这些作品开掘了人们在爱情生活中的感情世界，颂扬高尚的品德、优美的情操；鞭挞丑恶的灵魂和卑劣的行径，较之过去那种把爱情生活简单化、政治化的作品，无疑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二是学术讨论空前活跃。在“双百”方针鼓舞下，文艺批评和文艺现论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文艺界对诸如文艺方向、文艺与政治、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阶级性和人性、题材与风格，以及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民族形式、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已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争鸣、探索。其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以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文章，都以坦诚的态度，针对理论研究或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新鲜、独到的见解。尽管他们的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种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敢于直言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双百”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一九五七年一月，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发表署名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双百”方针提出异议，甚至要党收回“放”的方针。这一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不仅遭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反对，还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右的倾向也不时出现，干扰着“双百”方针的正确贯彻和执行。一九五七年五月，文化部发出了开禁《探阴山》的通知，接着又发出通知，将解放初期禁演的《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部剧一齐“放”了出来。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格调低下、带有色情成分的庸俗作品，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双百”方针毕竟为文艺界打开了繁荣发展的闸门，整个文坛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春天气息。可惜，这种初见繁荣的景象并没有坚持下去，随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倾思潮再度台头。“双百”方针遭到曲解，优秀作品和有见地的理论文章受到粗暴的批判，文艺界步入更加艰辛的境地。